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

《史集》第二卷

[波斯] 剌失德丁 原著 周良霄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

《史集》第二卷

[波斯] 刺失德丁 原著 周良霄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波斯)刺失德丁原著;周良霄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5-8993-7

I. ①成… II. ①刺… ②周…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元代 IV. ①K24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3369 号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

《史集》第二卷

刺失德丁 原著

周良霄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342,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993-7

K·2556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编辑缘起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非常重视对国学,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以中国学术要与国际学术接轨为号召。西域研究,尤其是对曾经生活于中国西部地区诸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古代西域是一个民族迁徙、融合十分频繁的地带,亦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枢纽,对西域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的研究是一门关涉多种学科的非常国际化的学问。是故重视吸收海外西域研究的成果,不但有利于提高中国学者之西域研究的水准,而且亦有助于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联合编辑、出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

西域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曾与近代中国的形成密不可分。清末中国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当时相当数量的爱国学者积极投身于“西北舆地之学”的研究,其成果对于中国领土不受瓜分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的确立和边疆疆域的界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西北舆地之学”自清嘉、道以后,就因缺乏新资料、新方法而渐趋衰落,而西方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却因另辟蹊径而成绩斐然。以法国学者伯希和为代表的一批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汉学、西域研究学者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和吐鲁番劫走了大量珍贵的西域

古文献,他们利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用汉语古音和民族、异国语、言互相勘同、比对等方法来处理、解释这些多种语言的古文献资料,其成就超出了中国传统的“西北輿地之学”,在西方中国研究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尽管今日世界的中国研究从方法到内容均已日趋多样化,但西域研究依然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够凝聚世界各国学者的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

从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西方学者不可企及的天然优势,不但数量庞大的有关西域的汉文古文献是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而且西域语言中的大多数是中国国内诸少数民族同胞依然在使用的活语言。中国学者本应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西域研究虽然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一代杰出学者的倡导下有过短期的辉煌,但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当王国维、陈寅恪今天被国人推为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时,中国的西域研究还没有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这样的局面将阻碍中国学术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进程,更不利于多元文化在中国的同存共荣与和谐发展。我们编辑《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意在激励中国学者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内充分吸收国际学术界的优秀成果,然后发挥我们潜在的优势,扬长避短,冀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国际一流学术水平间的距离,重兴绝学!

沈卫荣 李 肖

二〇〇七年五月

汉译注者弁言

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我对邵心恒循正先生遗命的执行。

邵先生早在抗日战争前就翻译过这本书，不幸在南走时稿子丢失。1948年顷，他又根据布洛歇 Blochet 刊本翻译和注释了忽必烈汗纪的一部分，发表在第一期的《清华学报》上；铁穆耳汗纪也完成了前半，没有发表。1959年，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助教，正从先生学蒙古史、元史。他让我用俄译本把这两部分译全，打算再由他校正、注释，作单行本出版；并进一步完成全书的译释工作。他翻出了自己颇显陈旧的旧稿，即忽必烈汗纪第一部分和铁穆耳汗纪开头的几页给我作样品，让我作成这一工作。我遵教完成了前述的两个部分。稿子交先生之后，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被调往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工作；他也一直没有机会来理落这件事情。这样一拖就是十数年。1973年四月，先生不幸离开人世，我的那份稿子也就永远不可能向他就正了。

关于刺失德丁《史集》一书的巨大价值，大家都是清楚的，用不着我再费辞。这本书长期在我国都不能见到它的全貌。清朝末年的洪钧，作《元史译文证补》，利用过贝烈津 Berezin 和埃德曼 Erdmann 所翻译的《史集》第一卷部族志与成吉思汗纪部分。1933年冯承钧翻译了多桑的名著《蒙古史》，这部书主要便是大量利用《史集》和其他中亚的原始资料写成的。同一时期，张星娘辑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也翻译了玉耳 Yule 在《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里所译的忽必烈汗纪片断。这些翻译，都只是一些片断，音读上讹错很多。尽管它们的刊出对中国的元史、蒙古史学界，确曾大大开拓了当时人的眼界，但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搞研究当然是困难的。因此，长时期来，大家都热望把这部重要的波斯史籍，完整地、较准确地翻译过来。

当然，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史集》是用古波斯文、阿拉伯文写成的。由于它在内容、语言、文字、版本以及收藏等方面特殊的复杂性，给我们对这部书的校刊、整理、翻译、注释等工作，都带来许多实际困难。一个人如果不是在客观的物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自己又广通汉、蒙和中亚、西欧的多种语言，并具备必要的元史与蒙古史素养，是很难于胜任这一工作的。这无疑便是百多年来，这部书在世界各国里翻译和研究进展迟缓的原因。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都不具备翻译、整理这部书的必要素养和条件；也清楚地知道转译这一类的工作是往往费力而又难于讨好的事。但由我们自己直接来整理、校勘、翻译《史集》这一名著还必不可免地需过一段时间。因此为了满足当前的急需，转译它无疑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前所述，最早我是根据俄译本转译的。1971 年波义耳 John. A. Boyle 的英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出版后，我又改用英译本转译。英译本是取布洛歇本作底本的，不能尽如人意。俄译本所依据底本（塔什干本与伊斯坦布尔本）则是公认的较好稿本，此外它又参考了列宁格勒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图书馆藏本、不列颠本、德黑兰本、巴黎抄本、东方研究所抄本以及布洛歇本等多种版本，作为汇校本翻译出版。它的出版本身无疑是蒙古史学界的一个很大的成绩。然而，问题也仍然大量存在。在所保存的内容上，塔什干本记载有关于窝阔台的葬地，特别是它较好的保存了一些蒙古和突厥的人、地名，这是布洛歇本所没有和欠缺的。但是，反过来也有

布洛歇本有,而俄译本却是阙漏的。察合台有八个儿子,俄译本除长子木秃干 Мутугэн 这一枝的子孙世系有详细记载外,其他七子: Муджяя(当作莫赤也别,因波斯文的音点讹误所致)、Белекеш(别勒格失)、Сарабан(撒儿班)、Есу-Мункэ(也速蒙哥)、Пайдар(拜答儿)、____、____(阙,布洛歇本作合答海 QDATY 与拜住 БАУЦУ)则都没有叙及,而这在布洛歇本里却可得到完满的补足。有些地方,是俄文翻译时的问题。波义耳在《克烈部的冬夏营地》一文中,曾经指出:在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第 126 页里,赫塔古洛夫 Khetagurov 的译文是:王罕的夏营地凡三处:Талан-Гусэур, Дабан 与 Наур。波义耳则认为,原稿本此处的三名本应竖读,而不是横读。它们实际上指的是两处,即 Талан-Дабан 与 Гусэур-Наур。前者即《元史·太宗纪》六年之达兰达葩,其义为“七十山口”。后者即《元朝秘史》第 151 和 177 节之“古泄兀儿海子”,蒙古语 Наур 海子(湖),汉语音译为“脑儿”或“纳兀儿”。克烈部左翼之冬营地,俄译本列了八个地名,波义耳则认为,实为四处。如 Айджэцэ 与 Кутукэн 二词,显应连读,实即 Abji'a-Köteger 之讹。此名见于《元朝秘史》第 187 和 191 节,作“阿卜只阿阔迭格儿”。^① 有关蒙古、突厥的人名、地名保存较好,本是塔什干本的最大优点。但是在俄译本中,对于大量疑而难决的词,译者多数是采正文中付阙,而用脚注的形式,详列诸本异同。在我们所涉及的第二卷维尔霍夫斯基 Верховский 的译本中尤多这类现象。俄译本的前言中,苏联学者们已申明,这些脚注“除异读和音读之外,一般只提供了正文所必需的解释”,“并非代替考释”,注释的工作要等到三卷出完后再行刊出。^② 这种详列异同的脚注方式表现了译者的谨慎,为不能接触各种稿本的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值

① 波义耳《蒙古世界帝国》The Mongol World Empire。

② 听说这一卷前半部的注释本已经出版,遗憾的是我尚未能得到。

得赞扬的。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抄胥致误,鱼鲁亥豕,而且有的地方明显的是俄译者取舍无方,这就不能不大大限制了俄译本的水平。

波义耳的这个译本,与俄译第二卷的译本比较起来,有它的一些优点。第一,在内容上比较全。它虽然以布洛歇本为底本,但把塔什干本具有的段落以注的形式采译了过来。在人名、地名的音读方面充分利用了俄译本的成果。第二,他在翻译尤外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基础上,充分地利用了西方学者关于蒙古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写出了许多卓具水平的注释。因此,可以说,如同他翻译过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一样,这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也完全可以视为一个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波义耳也有其缺点和问题。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他不懂汉文,不能够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而在这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作大量的补、证、考、释的工作,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波义耳所长的基础上,以我所长,补其所短,把研究工作推进一步,这就是我翻译英译本的理由和愿望。

由于我的译稿有遵行邵先生遗命的缘由,所以在文字上我仍沿用邵译稿所使用的浅近文言文。这种文体对于《史集》这种著作原有的文风是切近的。在注释的形式上也仿用他所使用的办法,在翻译的同时,逐字逐句地进行补和证的工作。对波义耳的注释,凡是于我们有参考价值的,我都尽可能移译过来,以“原注”来进行标示。我所作的注释,则以“周按”来标明。还有少部分的注释,是邵先生译稿中的(包括《忽必烈汗纪》前半部分及未发表的《铁穆耳汗纪》的前半部分),我也尽可能地恭录过来,以“邵按”标示,一以丰富本书的内容,再则也算作纪念。遗憾的是因译文有不同的地方,体例受限制,我无法把它全部照录;抄录的地方也作了某些文字上的删节修改。原书附录有《难字表》,我都把它们分别收在按语中,不再保留。纪年表、世系表、汗位承袭表则是我根据需要编制的。

从我翻译这本书开始到现在,总共已二十四年了。中间停停改改,四易其稿。今年年底才得空最后定稿誊清。有两件事情我必须在这里特别申明:

第一,近年来,朮外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与刺失德丁的《史集》第一卷第一册,已分别由何高济、余大钧同志翻译出版。对这两位波斯原作者的名字,他们译为“志费尼”与“拉施特”。我在这次定稿时则仍决定沿用自己习惯的译法,译文也仍用自己的旧译,不再根据他们的译本来改正,这是因为译名问题究竟哪样更好,我仍感犹豫;译文则是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内容,牵一发而动全身,改动会太大。在这里我向两位同志深表歉意,也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第二,本书在译文上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林书武同志校正,受益良多。我谨向他深致谢意。

在《史集》第一卷第一册汉译本的序言里,翁独健先生特别提出:在对这部名著进行汉译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开展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和蒙古文史料的互校互证,更科学地继续和发展洪钧所开创的‘补证’工作”。像《史集》这样的著作,没有必要的校和证的工作,的确是很难为一般研究者所利用的。我所作的工作,也便是翁先生所指示的互校互证工作,水平虽然甚低,但总算是一个开始吧!

今年是邵循正先生逝世十周年。十年前的初夏,我们正在中华书局标点《元史》,一间小房里,对床而卧。他已经多年病喘了,白天不停,夜深尤甚,往往是彻夜不眠,而第二天却仍坚持工作。整整一个星期,我和衣而睡,在他喘息的时候起身给他捶捶背,送口水。四月底的星期六他被送回家去,谁料四天之后便突然去世。回首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十年一瞬,作学生的我,少善堪告慰先生之灵,谨以这本书的完成,作为永远的纪念。

又 记

此稿完成于 1983 年末,迁延周折,几难免覆瓮之厄。幸得中央民族学院及王钟翰教授之资助、推荐,始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惠允出版,私心感激,难以形容,非仅为拙稿之得面世,亦庆学术风气之终未泯也。负责此书的编辑林雄同志,不憚繁琐,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并此致谢。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原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贾敬颜先生,他对本书的出版也曾做过热心的帮助,然不幸已归道山,致无由请教,思之怆然。谨致哀思,聊充纪念。

1990.7.25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再 记

1993 年顷,此稿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已完成三校,准备付印。突然出版社通知我,因赔累太甚,不愿再出(闻是中央民院已取消补贴)。但他们仍好心地愿将三校稿无偿赠我,任作处理。我当时真是束手无策。幸有素昧平生的林雄先生仗义施援,教我自筹四千元为资,而他则个人无偿为我操办所有联系印刷及代售一切事务,终使此稿得以面世。两年后,所印 1,000 册书售完,林雄先生又退我二千元,侠义可感。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厚意,将此书改动版式后重新出版,责任编辑蒋维崧先生、胡文波先生不憚繁劳,辛勤从事,俾此稿得以更广泛流布,或能于蒙元史研究少所推进。感激之余,何快如之,何幸如之。

周良霄

2017 年 10 月于北京

英译者前言

这本书是计划作为我翻译的尤外尼 Juvainī 著《世界征服者史》*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的一个补充。尤外尼书止于蒙哥统治时期(1251—1259年),而刺失德丁 Rashīdal-Dīn 的《史集》*Jāmi'al Tavārikh* 一书的这一部分则续记蒙古帝国的历史,一直到蒙哥的侄孙铁穆耳完泽笃 Temür Öljeitü 统治时期(1294—1307年)。我翻译的底本是 1911 年出版的《吉布纪念丛书》Gibb Memorial Series 所收的布洛歇 Edger Blochet 刊本。1960 年的维尔霍夫斯基 Verkhovsky 俄译本是利用了两个迄今仍未出版,而布洛歇所不知道的稿本而成的。一个稿本存塔什干 Tashkent 国立公共图书馆,不署年月,但明显地成于十四世纪初。^① 另一个稿本存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的 Topkapī Sarayī 图书馆,署 1317 年,即刺失德丁死前的一年。^② 这个刊本在一些方面要较布洛歇本完满。譬如:它包括有大汗窝阔台的葬地,这是后者所没有的。这些段落我们已从俄译本采纳进来,加以翻译,作为脚注收入。然而,维尔霍夫斯基刊本主要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较好地保存了突厥和蒙古的

① 周按:塔什干乌兹别克共和国国立公共图书馆 Джурабек 藏书中的一个抄本。存 264 页,约成于 14 世纪。它在一些专用名词方面保存比较精确,但一些字母上却音点脱落。

② 周按:此本所署日期为 717 年沙班月(1317.10—11),与塔什干本近似,但书写草率,脱讹较多。

人名和地名,而这点在布洛歇所据的后来的稿本中是颇呈讹乱的。维尔霍夫斯基不常采用这些音读,但是它们却被谨慎地著录在他的注解之中。这些对解决刺失德丁著作中呈现如此混乱的名字问题,最终地有着极大的帮助。

关于这一类的问题,其中的许多当然早已在韩百诗 Louis Hambis 所译《元史》第一〇七卷^①附伯希和 Pelliot 的注解里面解决了。在那个著作中,其丰富的世系资料,不单源自中国的史料,同时也来自刺失德丁的著作——这个世系表包括在维尔霍夫斯基译本上而为布洛歇刊本所无,已无需在此复述。因之,我代之以提供一个包括各王朝统治者的简表。多厄费尔 Gerhord Doerfer 在 1963—1967 年问世的前三卷不朽的著作《在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份》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n Neupersischen 同样使我们没有必要来为《史集》中丰富的突厥语和蒙古语作详细的注解,因为读者在多厄费尔的著作中已可以对这些辞语找到完满的说明。而一部分在英译本中使用的突厥语与蒙古语则在附录的《难字表》里作了解释,表中还包括了一些源于波斯或阿拉伯语的伊斯兰辞语。没有一个作品比起伯希和的遗著《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 对我的研究帮助更大。这个作品中经常涉及到布洛歇的刺失德丁书刊本,对两位作者共有的历史与地理问题发表了很多新见解。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正如在处理我早先的翻译一样,我能再次商之于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教授克利夫斯 Francis W. Cleaves;我也同样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部的高级研究员罗依果 Igor de Rachewiltz 博士得到很大的帮助,他为我好心地解说了《元史》中的几处段落。我深切地感激这两位学者,因为他们给了我接触那些除汉学家外,迄今大部仍是覆而未发的资料的便利。

① 周按:即《元史·宗室世系表》。

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名字,在翻译中是依据皇家亚细亚学会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系统拼写的。另一方面,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拼写则尽可能地依据这些有更为纷繁的韵母的语言的发音规律。ö 与 ü 同于德文的拼音(法文的 eu 和 u),i 如同俄文的 и(波兰文的 y)。刺失德丁的汉文名字和语辞的拼音是作为蒙古语拼写的十三世纪中国官话而被保存在原本中。我们采用 Wade-Giles 的正字法作了注解;但常见的邮政转写的现代地名则除外。譬如:用 Siangyang,而不用 Hsiang-yang;用 Fukieu,而不用 Fu-Chien。凡是拼写有错误的,如同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一样,也用大写的字母在注释里注明。也如同在那个著作中一样,阿拉伯文的句子和段落原文,都以斜体来表示。

关于参考资料书名的缩写,我一般用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或者是在作者的名字后面写出书或论文出版的年代。如克里夫斯 1952;约翰 1969。或者,特别是对那些经常引用的作品,都采用了标题的缩写形式,如《亲征录》、《金帐史》。这些缩写的图书单详见附录部分。

刺失德丁随蒙古史料以十二属相纪年,虽然大部分时候均附以相应的回历年代。在所有情况下,我在注脚中都提供了相应的儒略历年代,并且认为备置一个 A.D.1168—1371 年间相应的生肖周回年代表,作为附录,是有益处的。应该指出,它们所示的相应年代只是近似的。生肖纪年的年初始于太阳进入宝瓶座十五度,其时在儒略历纪年大约是一月二十七日(现为二月四日)。

最后,我对 Leverhulme Trust 给予我准备《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一书的资助致以谢意。感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东语言文化部主任厄森牙尔萨特爾 Ehsan Yar-Shater 教授把此书列入《波斯遗产丛书》Persian Heritage Series。德黑兰大学阿巴思扎尔亚布 Abbas Zaryab 教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要求修改译文;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执行编辑布尔纳德格罗涅尔特 Bernard

Gronert 先生和负责我稿件的巴尔巴刺佐喀瓦失 Barbara-Jo Kawash 女士在出版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我的朋友东方与非洲研究所近东与中亚部负责人伯金翰 Charles F.Beckingham 教授及伦敦大学阿拉伯文教授约翰斯敦 Thomas M.Johnstone 教授为我校对，并此志谢。

波义耳 John A.Boyle

曼彻斯特，12，1970.

关于作者和作品

——关于作者

刺失德丁 Rashīd al Dīn Faḍl Allāh，经常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之为刺失德塔比 Rashīd Ṭabīb（刺失德医师），1247 年生于哈马丹 Hamadan，即古之厄克巴塔那 Ecbatana。关于他早年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作为一个犹太医药房主的儿子，他在三十岁时转奉伊斯兰教。可以推想：他早先曾是本城犹太社会中忠诚的成员。当时这个重要的犹太文化中心和组织得很好的 Yeshivah 或犹太法学院学院的所在环境，使他稔熟犹太教的习惯和传统，以及希伯来语的知识。^① 他的改奉宗教可能与他以医术进侍蒙古在伊朗的第二个统治者、伊利汗阿八哈 Abaqa（1265—1281 年）相联系的。他可能与被称作刺失德杜拉 Rashīd al-Daula 的犹太人同为一人（他

① 原注：关于刺失德丁的犹太族属问题，见 B.Spuler：《在伊朗的蒙古人》1939，第 247—249 页。W.J.Fischel：《犹太历史上的阿塞拜疆》1953，第 15—18 页。

的名字的别一形式)。依据巴尔黑布鲁斯 Barhebraeus 的续编者所述,他被任为伊利汗乞合都 Geikhatu(1291—1295 年)的侍膳官,“随时备办各种需用之食物……”我们得知,当仿行中国的纸币钞而发生经济暴乱时,甚至连伊利汗的餐桌上也得不到一只绵羊。刺失德杜拉“在这一事件中顽强坚持,花费了自己巨额的钱财,购买大量牛羊,指派屠夫和厨师。因为国库空虚,缺乏金钱,库里甚至连最小的铜币也找不到。他决心以最奇特的方式为理财长官 Ṣāhib-dīwān 每月征收白银。他写信致送各地区,但是犹太人不能征收到任何东西。这样,他的全部资财告罄,他已不能再继续担负他所作的工作。他便逃跑了”。^①

如果这个刺失德杜拉不是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那么,具有这样才能的一个人,竟然不是进事阿八哈,而到近二十年之后,即 1298 年春,却作为阿八哈之孙合赞 Ghazan(1295—1304 年)的维昔儿 Vizier 沙的儿丁 Ṣadr al-Din Janjānī 的代理人出现,就是件奇怪的事了。刺失德丁本人详述了导使沙的儿丁死刑的情况,可能就是这个伊利汗维昔儿极不忠实与毫无原则的表现。纪事中显示出来他已大得伊利汗的宠幸,且与伊利汗的总司令、蒙古人忽都黑沙 Qutlugh-Shāh 缔交。1298 年秋,沙德丁 Sa'd al-Dīn Sāvajī 被任为沙的儿丁的继任者,且引刺失德丁为其助手。接着我们就听到刺失德丁作为合赞最后一次远征马木鲁克 Mamlūks 的同行者。1303 年三月,在导致刺黑巴塔瞻 Raḥbat al-Shams,即今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叙利亚城市梅亚丁 Meyadin 投降的谈判中,他扮演了卓越的角色。在合赞短暂的统治期内,他着手财政改革。这个改革是在君主的名义下进行的,而刺失德丁本人才是其真正的作者。改革希望保护定居民免遭蒙古游牧贵族的劫掠。这时,合赞还委

① 原注: Gregory Abū'l Faraj 编年, E.A. Wallis Budge 编译, 牛津与伦敦, 1932。周按: 参见多桑《蒙古史》下册, 第 247 页, 注③。